

安贝托·艾柯的阐释观：无限与有界^①

周 强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安贝托·艾柯的阐释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阐释的无限与有界。阐释的无限开放性集中体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艾柯的《开放的作品》这一知名学术著作中。艾柯将欣赏者和接受者置于重要地位,提倡接受者对作品的阐释过程应积极参与。然而,随着德里达、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等解构主义思想家们所倡导的批评方法的激发,在阐释实践中读者阅读文本的权利不断扩张,呈现出了“无限衍义”的情形。针对此现象,艾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明确提出应该为文本阐释设定某种界限的理论,力图为阐释寻找一种合法的界限,在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关键词:安贝托·艾柯;文本阐释;阐释学;《开放的作品》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2-0041-03

Umberto Eco’s Hermeneutics: Unlimited and Bounded

ZHOU Qi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Abstract: Unlimited and bounded interpretations are two aspects of Umberto Eco’s hermeneutics. The unlimited openness of interpretation is fully embodied in the *Open Work*, a famous academic monograph by Eco published in the 1960s. Eco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ppreciator and the reader, encouraging the active interpretation participation from the acceptor. However, inspired by the critical approach advocated by deconstructionist theorists, such as Derrida, Paul de Man and Hillis Miller, the right of the reader to interpret the text in practice has expanded gradually, resulting in unlimited interpretations to which Eco put forward a theory to impose a certain limit to textu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late 1980s and the early 1990s in an attempt to keep balance between the author, the text and the reader.

Key words: Umberto Eco; textual interpretation; unlimited; hermeneutics; *Open Work*

作为具有国际声望的当代著名符号学家之一,意大利学者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符号学理论深受各国符号学研究者的重视。然而,作为与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克利斯蒂娜·布鲁克-罗斯(Christine Brooke-Rose)以及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齐名的当代阐释学大师,艾柯的阐释观也广泛为大家所接受。因此,进一步梳理艾柯的阐释学思想,对于我们反思作者、作品和读者的关系,判断文本阐释的可能性及阐释的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文本阐释的无限开放性

1962 年,艾柯出版的《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这一理论巨著在意大利乃至西方文艺理论界掀起了巨大波澜,被誉为意大利新先锋派的代表性著作。在著作的开始部分,艾柯便提出了“开放的作品”的艺术理论。他指出:“任何艺术作品,即使是已经完成、结构上无懈可击、完美地‘划上句号’的作品,依然处于‘开放’状态,至少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阐释它,而不至于损害它的独特性”,从而集中体现了阐释的无限开放性这一特点。^[1]

① 收稿日期:2010-01-04

作者简介:周 强(1984-),女,山东潍坊人,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中西修辞比较研究,中西语言哲学理论研究。

“开放的作品”是为接受者的积极参与而充分展开的作品,此类作品含有多重意义层次,具有动态性、多样性等特点。“开放的作品”本身蕴涵了丰富的可阐释空间,能使接受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参与到对作品的理解与感悟中,可以由接受者自由发挥想像对其进行有效果的具体补充,从而使其在不同接受者那里产生不同效果;即使是同一个接受者面对同一部具有“开放性”的作品,他在不同时刻和不同心境下对作品进行欣赏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开放的作品”能呼吁接受者充分参与到对作品的接受中,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同作者一起创造作品。^{[2]26}

艾柯提出“开放性”这个概念,由此出发,他强调了在阐释过程中接受者的主体性的发挥。由于接受者的不同使阐释实践具有一种不确定性,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阐释的无限开放性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开放性的存在使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了,对不确定性的补充和完善,形成差异性解读。

二、文本阐释的有界性

艾柯在强调接受者主体性的同时,并未走向极端。1990年,艾柯提出了“过度诠释”的问题。在他看来,如果过分夸大诠释者的权利,种种离奇又无聊的诠释便可能毫无节制地一拥而上,这就是“过度诠释”。他认为文本意义解释的这种无限性并不是自由的、随意的,不应陷入无休无止、不断推衍的不确定性过程之中,而是有其前提的,受到文本客观性的限制。“作者向欣赏者提供的是有待完成的作品……作品完成后依然是它的作品,而不是别的另一部作品,尽管这一形式是别人以一种作者本人并不完全可以预见到的方式组织完成”。^{[2]24}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艾柯明确提出应该为文本阐释设定某种界限的理论。他认为,“作者意图”、“文本意图”和“标准读者”都会为文本阐释设定一定的限制,正是这些因素限制了意义产生的语境范围,界定了文本阐释的可能性范围,超出这一范围的阐释就成了“过度阐释”。

艾柯认为,“作者向演奏者、解释者、听众提供了一部有待完成的作品”^{[2]48},并且通过文本提出众多可能性。这些众多可能的文本阐释正是作者在合理地组织文本的过程中所激发和赋予的。此外,经验作者必须被授予某种特权,将某些阐释摒弃在“合法阐释”之外。^{[3]34}在“极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

大背景下,艾柯还是巧妙地肯定了“作者意图”在文本阐释中的地位,给文本阐释设置了一个宽泛的界限。

在剑桥大学的“丹纳讲座”上,艾柯又提出“文本意图”这个概念。“文本意图”是文本本身所隐含的意图,它并不能从文本表面直接看出来,也不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就已经清醒地、全面地预想到的,它是由读者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推测出来的。有些文本意图,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可能并未明确意识到,但是文本自身的存在却在昭示着它的合法性。“文本意图”根据文本的连贯性及其原初意义生成系统来判断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是否就是文本接受者根据自身的期待系统而发现的东西”^{[4]89}。它既不同于文本产生以前业已存在的“作者意图”,更不同于因人而异的“读者意图”。艾柯试图在“作者意图”与“读者意图”之间保持某种辩证的关系,而能够维持二者关系平衡的就是“文本意图”。“文本中作者‘潜意识’甚至‘集体/个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和阅读中读者主体意识的自由介入分别对作者意图和读者意向构成了干扰因素,而文本的稳定状态决定了文本意图的可靠性,使之成为给作品定性的唯一标准”^{[3]48}。“文本意图”存在于“无法企及的作者意图与众说纷纭、争执难下的读者意图之间”,“它使一些毫无根据的诠释立即露出马脚,不攻自破”^{[4]84}。从这一点说,“文本意图”是对文本阐释进行限制的重要因素。

艾柯在《读者的作用》这部著作中提出“标准读者”这个概念,其大意为原著所想定的读者,是作者假设“与他共享相同代码的一群可能性的读者”^[5]。艾柯的“标准读者”概念是针对解构主义的激进阅读理论而提出的,用以说明文本与读者之间的某种辩证关系。艾柯指出“标准读者”是对“文本意图”进行正确揣测的读者,是能够以“文本应该被阅读的方式去阅读文本”的读者^{[4]89}。艾柯诠释学认为,读者总是怀着某种个人的信念去诠释文本。这种信念不管是隐藏的,还是表露的;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在一定层面上确实存在。于是,原文本和原文本的诠释就有了不对称的符指,也因此导致了诠释对原文本的背叛。可见,艾柯此时以稍加详细的方式提出文本阐释应如何受到约束。

在艾柯看来,任何对文本的解释都要涉及文本自身的意图、特定读者群的“期待视域”和理解文本所需的文化背景等因素,这就意味着判断阐释的合理性不但要考察读者本身的因素,更要考察这种阐

释是否符合文本及其广阔的文化背景。读者的积极作用之一就在于对文本的意图进行推测。读者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对文本的意图进行猜测,在多种多样的阐释中,只有那些符合“文本意图”的阐释才能成为合法的阐释,超过这一界限的阐释都可以被认为是不好的或者勉强的阐释,更极端的则是对文本的一种“使用”。

三、结语:艾柯阐释观的价值

无论是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的一般阐释学,还是德国现象学、哲学阐释学,抑或是后期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在实际研究中都需要关注一个终极问题,即阐释的权利在于何处。这个阐释学所关注的终极问题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三次转向中也有体现:西方文学理论在20世纪经历了由作者中心论向作品中心论,再由作品中心论向读者中心论发展的三次重要演变,分别给予作者、作品和读者以重要地位,使他们处于文学研究的核心地位,赋予他们阐释文本的终极权利。

艾柯的阐释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阐释的无限与有界。阐释的无限开放性集中体现于20世纪60年代艾柯的《开放的作品》这一知名学术著作。艾柯关注了作品的开放性、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交流等问题,择取了当时意大利的诸多先锋艺术样式,将欣赏者和接受者置于重要地位,提倡接受者对作品的阐释过程应积极参与,在当时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后来提倡“读者中心论”的学者们极具启发性。然而,随着德里达、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等解构主义思想家们所倡导的批评方法的激发,在阐释实践中读者阅读文本的权利不断扩张,呈现出了“无限衍义”的情形。针对此现象,艾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明确提出应该为文本阐释设定某种界限的理论,力图为阐释寻找一种合法的界限,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艾柯的这一理论,限制了意义产生的语境范围,从而使文本意义生成的无休无止、不断推衍的

不确定性过程有效停止。

在艾柯的阐释学理论中,既提出了“开放的作品”理论以呼吁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又提出了“经验作者”、“文本意图”和“标准读者”等概念来为读者的阐释设限。他的这种看似从“读者中心”向“作品中心”的转变遭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质疑,被认为是其学术研究中的退步。批评者持这种观点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批评者未能掌握艾柯早期研究的理论基点和时代背景,单纯地把艾柯早年对接受者积极参与作品实现的提倡视为“读者中心”理论的体现,未能从整体上把握艾柯思想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事实上,正是艾柯前后思想中的这种看似“转变”,形成了艾柯阐释学思想的独到价值——将作者、作品、读者纳入同一理论视域进行考察,以一种辨证的态度对待阐释。

艾柯关于“经验作者”、“文本意图”和“标准读者”的论述从整体上把握了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联系,既给予阐释活动以积极的能动作用,又使其不会偏离合法的轨道。这种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辨证统一性正是艾柯阐释学观点独树一帜之处。

参考文献:

- [1] 伊夫·塔迪埃. 20世纪的文学批评[M]. 史忠义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235.
- [2] 安贝托·艾柯. 开放的作品[M]. 刘儒庭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 [3] 林 斌. 文本“过度阐释”及其历史语境分析——从《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反犹倾向”谈起[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4).
- [4] 安贝托·艾柯. 诠释与过度诠释[M]. 王宇根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 [5] Umberto Eco. 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7.

责任编辑:卫 华